

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路径*

李长成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合理性; 合法性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从合理性和合法性两个维度对现代性展开了文化批判。前者批判的是工具理性及同一性思维, 指出了出路在于变革哲学范式; 后者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探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变革的前景问题。其现代性批判思想留下了诸多让我们深思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 B7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7)01-0023-05

On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Theory of Modernity

LI Chang-ch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rationality; legitimacy

Abstract: The Frankfurt School develops the cultural critique of the modernit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The former is directed to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identical thought, its solution being reforming the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he latter criticizes the basis of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legitimacy in ideology and explores the prospect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It leaves much scope for deeper reflection.

现代性论争的发轫同法兰克福学派直接有关。但国内对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探讨不充分, 只是注重于对其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的探讨, 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了其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丰富性。本文从合理性与合法性两个方面揭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思想。

一

马克斯·韦伯最早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对西方理性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 “理性主义”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内容, 不能将合理性仅仅等同于工具理性。通过对加尔文派等新教苦行主义职业伦理行为的考察, 韦伯实际上区分了包括目的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以及传统行为在内的不同合理性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本身包含了工具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 “这种类型学所立足的是可以指引行为者目的的行为的行为目的范畴: 诸如功利目的、价值

目的以及情感目的。”^[1]在此基础上, 他把新教徒的行为类型看成是实践合理性, 这种行为类型把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实质合理性)融为一体。不过, 韦伯并没有真正把社会关系当作出发点。在他看来, 合理化内容就是指目的论独白式行为中的目的—手段关系。因此, 目的合理性行为是其类型学的“基点”。从此出发, 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进行了考察和诊断。他指出, 合理化的过程是价值理性逐渐衰竭而目的理性不断获得制度化的过程, 它给人们带来的是坚固的“牢笼”和冰冷的“冬夜”, 是意义的失落和自由的丧失。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承了卢卡奇整合社会合理化与物化来批判现代性的思想, 深化了韦伯提出的问题。他们立足于反思启蒙理性沉浮起落的历程, 解释启蒙理性自身是如何“从洞察万物之意义的力量中蜕变成自我保存的纯粹工具性”^[2], 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主要扎根于他们所面临的基本的历史经验, 即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最终使人们摆脱恐惧,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树立自主。这种理性具有以下规定性:(1)它以唯我论为前提,目的在于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这在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新时期的最高哲学原理中得到彰显;(2)唯我论前提必然导致主客二分的立场,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成为主体控制和支配的对象;(3)它将形式逻辑和概念当作算计世界的工具,让不同的事物相等同;(4)它将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看作是“人类理性的骄傲”,是人类知识力量的证明。于是,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仪式”,数字成为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处于因理性的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种不可避免的灾难正是启蒙理性的宿命,启蒙理性实质上就是控制人和自然的工具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启蒙理性自身之中就埋藏着导致野蛮状态的种子,现代社会合理化进程必然造成人的异化。

马尔库塞指出,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实质上就是技术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具有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压抑功能,使当代工业社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新型极权社会,异化无处不在。从政治领域来看,各对立的政治派别趋向于一致,尤其是作为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逐渐被同化,满足于痛苦中的安逸生活;从文化领域来看,一方面,高层文化日益媚俗化,成为商品生产的一部分而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另一方面,本能领域也存在着压抑性的俗化趋势;从思想领域来看,实证主义流行。

哈贝马斯赞同上述对工具理性和物化的批判。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真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获得制度化的只是人的工具行为,最终带来的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另一方面,合理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合理性,人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尽管受到扭曲和压制,但扎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的潜能并没有完全枯竭。而释放交往合理化潜能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哲学范式、从理论哲学范式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转换。第一代批判家之所以忽视交往合理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仍然停留在意识哲学范式的基地之上,

将合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合理性,最终只能到艺术王国中寻求理性的踪迹。

二

在对工具理性展开批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对同一性思维进行了清算,因为理性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将万物同一化并建立一个无矛盾的同一性体系之目的。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在《启蒙辩证法》中已经初现端倪,但主要还是由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阿多诺迈出的。阿多诺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并不仅仅出于纯粹思辨理论的兴趣,而是与这一时代的苦难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阿多诺看来,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基本原则或核心就是同一性。“奥斯威辛”这种同一性的“暴政”既是西方文化的必然命运,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3]362}。

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首先是对“概念帝国主义”和体系的批判,而这又主要是围绕同一性思维的完成者黑格尔哲学展开的。

黑格尔虽然反对抽象的普遍,强调包含特殊的普遍,但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所谓的特殊直接就是普遍,他实际上总是毫不留情地拒斥“被外部偶然性,被玩笑,而不是被理性所规定的性质和特性”,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阿多诺坚决反对特殊性的一般概念有权去支配它在抽象过程中意指的东西,肯定在历史的高度上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是“尚未成为概念实例的东西”。^{[3]6-13}与此同时,阿多诺也反对海德格尔进行无概念的思。阿多诺所抨击的,乃是“概念帝国主义”或“概念拜物教”。

对于体系,阿多诺指出它意味着总体性,其实质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和奴役关系之写照,“体系的形式对世界是合适的,世界的实质逃避人类思维的统治,统一和一致同时是一种被平息的、不再对抗的状况向统治性的、压抑性的思维坐标的纯粹投射。”^{[3]23}因此,在阿多诺看来,哲学按其本性应该是反体系的、反总体的,获得了解放的人类也决不会是一个总体。

阿多诺进一步揭示同一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正是同一性的社会模式。资产阶级社会将使用价值置换为抽

象的交换价值，强迫前者从属于后者，所采用的规则正是同一性原则，“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3]143}

在批判概念拜物教和总体性体系并从中觉醒之后，如何走向非同一性的事物本身呢？在阿多诺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拯救辩证法，因为“从一开始，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拉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3]3}。阿多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总清算，并描述了否定的辩证法。首先，否定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并不预先采取任何一种立场。其次，辩证法不再将绝对的同一起视为哲学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放弃对和解或乌托邦的希望和追求，但这种和解是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一种平等自由的交往关系——阿多诺用“星丛”这一美好的名称来命名这一关系。最后，阿多诺特别强调了辩证法与修辞学的关系。修辞学代表着那种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被思考的东西，辩证法意味着企图批判地挽救修辞学的因素。阿多诺力图吸取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对语言及修辞学的重视这一传统来反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丰富他对辩证法的思考并更好地拯救其内容。

阿多诺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和清算切中肯綮，但否定辩证法仍然以主客对立为前提，这就决定了他并不能真正走出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为了避免这一晦暗的前景，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对当代语言哲学转向中语用学思想的吸取和发展来解决“一”和“多”的问题。“交往行动作为基础的那种以达成理解为取向的语言使用，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挥作用的：参与者对他们的言语活动之被主张的有效性，要么表示同意，要么说清楚他们在进一步行动过程中将一起考虑的那些异议。”^{[4]22}而有效性表现为“两幅面孔”：作为主张，它们突破和超越了所有地方性的局限；同时，它们必须在此时此地提出和接受。

哈贝马斯坚决反对激进的语境主义或多元主义，认为它不过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面而已。他指出，“社会尽管失去了中心，但也不能没有主体之间形成的共同意志的同一性这个基本

点”。^{[5]16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放弃差异性或压制差异性，“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笼罩着一切语言共识的差异性的阴影：‘所以，一切理解同时不理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分歧。’（洪堡语）由于主体间的语言沟通从本质上讲存在许多漏洞，由于语言共识并没有消除说话者视角的差异性，而是把这种差异性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以交往为趋向的行为也适合于充当使社会化和个体化融为一体的教化过程的媒介。”^{[5]46-47}

三

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必然使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发生变化，韦伯指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他区分了合法性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合法型的统治（称亦“理性的统治”、“法理型的统治”、“正当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合法型的统治是实行科层制管理的现代国家所特有的，在合理化过程中日益失去价值理性基础的现代国家将合法性建立在合乎形式理性的法律基础之上，它使一个逐渐脱离其道德实践基础的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获得稳定性。但是，一种建立在合乎形式理性的法律之上的统治如何才能赢得合法性即获得合法化呢？这可以通过对程序正当性的信仰而实现。当然，程序合法化并不意味着回到法律规范的道德—实践论证的形式前提上去，而是要坚持司法、执法和立法的程序规则。

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国家是建立在合乎形式理性的法律之上的一种独特的合法性类型。不过，人们自愿服从某种合法性类型并不代表它们是值得承认的。卢卡奇并不认为合法性可以被理解为程序正当性，进而明确批判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之为真正的国家的观点。

那么，资产阶级国家如何获得合法性呢？与韦伯求助于程序正当性不同，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合法性的最重要途径是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尤其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得到充分的体现。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接受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批判，但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予以丰富和发展。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是技术

理性向文化领域扩张的结果,它执行的是意识形态功能,文化产品的产品就把人们拴在压迫他们的社会秩序上。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指出,技术理性本身成了意识形态,起着统治和奴役人的功能。由于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加强,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单向度的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陷于瓦解之中。这样一来,政治上的变革几乎不可能,剩下的任务只是纯粹的理论批判,等待未来的“收信人”。

哈贝马斯则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类型区别于原始社会、传统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类型。自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指的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联姻,它在资产阶级民法的形式体系中得到确定,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国家权力对内主要是用来维持一般的生产条件,保障市场调节的资本能顺利运行。自由资本主义形成了等价交换的意识形态,经济系统自身成了合法性的根据,“政治系统能够继续‘从上’而不是‘从下’(借助于文化传统)得到合法化”^{[6]54}。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由此就表现为经济控制问题,即系统危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决定了这种危机的不可根除性,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前提。

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出现的功能失调,资产阶级通过对形式主义法律的变革,建立了一整套福利制度,旨在弥补自由交换的功能失调。这一方面使经济危机转移到政治系统,造成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即合理性危机;另一方面则使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陷于瓦解之中,造成动因危机,导致了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危机,尤其是合法性危机明显占居了主导地位。如此一来,晚期资本主义如何能够获得合法性?哈贝马斯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技术的科学化趋势相关,更准确地说,是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相关。“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6]69}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赢得了大众的忠诚,部分满足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需求。可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又使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再次凸显。那么,究竟如何解决晚

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呢?

在哈贝马斯看来,通过公共领域的自发的无强制的交往实践,可以完成资本主义法律民主制度的变革,彻底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就法律制度的变革而言,在扬弃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由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向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转变。“实现权利体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之建成,既不依靠自发运作的市场社会的力量,也不依靠有意运作的福利国家的措施,而是依靠出生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通过民主程序而转化为交往权力的交往之流和舆论影响。”^{[4]545}这样一来,对合理结果的规范性期待归根到底要依赖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具有建制结构的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是一个本意不在于形成决议、在此意义上不具有组织形式的公共领域的自发的、不受权力控制的交往之流”^{[4]645}。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将使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得到统一,完成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主观向程序民主观即商谈论民主观的转换。这样一种激进民主观的核心,在于“民主程序通过运用各种交往形式而在商谈和谈判中被建制化,而那些交往形式则许诺所有按照该程序而得到的结果是合理的”^{[4]377}。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哈贝马斯指出,必须对联合国进行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公民社会,进行全球治理。这种既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交往乌托邦”的建立,并不是一种思辨的遐想、一种抽象可能性,而是有其现实的事实根据,当今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公民运动以及发达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

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内容极为丰富。他们不仅仅展开了对工具理性及同一性思维的批判,而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探索了资本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因此,对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合理的定位和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在深入研究和思考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社会构成以及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整合机制的基础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进行了转换,对资本在文化心理领域造成

的异化进行了深入批判，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或文化哲学。这种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既区别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区别于苏俄马克思主义。从前者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而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微观层面开展了文化批判，他们更多地关注现代个人的普遍的生存境遇，对革命的态度较为复杂。从后者来看，苏俄马克思主义集中研究的是政治的上层建筑，探讨俄国作为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如何用社会主义来发展生产力、追赶现代性的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感受到的是日益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和革命希望的渺茫。不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原本’，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造，分别展示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风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化进程中必然走向多样化的趋向。”^[7]因此，只有联系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才有可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

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态度来看，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可谓最为彻底。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虽然揭示了启蒙理性自我毁灭的历程，但同时承认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启蒙批判的鹄的在于捍卫、传播和实现自由，而不是间接地促使世界走向宰制。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批判了“概念帝国主义”对差异性的压制，但他呼吁重建而不是拒斥主体性，希望废黜概念的专制而不是完全拒斥概念。正因为如此，“阿多诺从未像后现代理论家那样完全拒斥理性、真理、反思性的主体性或现代哲学，而是使用着经过重建的现代范畴。”^[8]哈贝马斯更是明确指出，现代性在合理性和合法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可抹煞，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本来就蕴含在其自身之中而不是之外。因此，与后现代片面强调差异性和反规定性相比，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态度更为可取，也更为接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立场。

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批判所显示的内容来看，它们包括合理性和合法性两个层面。合理性本身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成了意识形态，使晚期资本主义不断获得合法性。因此，对合理性的批判即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同时也是对合法性的批判，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同时，批判也不仅仅是指理论层面的，而是包含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不过，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思考更多的时候被指责为“艺术乌托邦”、“交往乌托邦”和“改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于“乌托邦”的指责，马尔库塞早已指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一种伟大的真正的超越性的力量，哈贝马斯同样认为乌托邦的核心是蕴含着希望的批判，没有希望，现实将不可能得到改善。对于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放弃激进民主的努力，哈贝马斯在《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而他在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对激进民主立场一贯的坚守，让我们看到西方左派宁折不弯的脊梁。

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过分注重了社会微观层面的文化分析，对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全球布展关注得不够。尽管哈贝马斯为避免阿多诺等人的理论困境，以交往理性解决“一”和“多”的问题，强调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是“对话的普遍主义”，并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但是他为科索沃战争所作的辩护，无疑让人看到在其普遍主义立场之后游荡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幽灵。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69.
- [2] 詹姆斯·施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69.
- [3]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4]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5]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6]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7] 何萍.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 [J]. 哲学研究，2003（8）：35.
- [8] 凯尔纳，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1.